

城市居民疏离感问题研究*

——以 2010 年上海调查为例

张海东 毕婧千

提要: 本文采用 OLS 回归分析法,通过分析 2010 年上海的调查数据,探究导致城市居民疏离感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个体特征变量(如性别和婚姻状况等)对疏离感有显著影响;社会地位、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和户籍隔离均对疏离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本文还探讨了上海户籍和非上海户籍居民的疏离感差异,结果显示,不同户籍的居民疏离感水平不同,且影响因素也不同。

关键词: 疏离感 社会地位 社会凝聚 社会包容 户籍隔离

一、研究背景

疏离感是测量主观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自 20 世纪 50-60 年代开始,如何测量和提高主观生活质量逐渐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界研究的热点。“疏离感”在社会心理学中应用广泛,是一个反映在社会整合语境下民众对社会迅速变迁反应的概念。当体制和社会结构经历重大变化时,由于社会转型或社会现代化的加快,社会整合程度降低。一般情况下疏离感与主要的个体适应困难相关联,导致个体生活方向迷失、不安全和边缘化感觉加强、欲望膨胀、相对剥夺感产生,问题的核心是社会价值观失范。处在转型期的社会,社会的快速变迁会带来社会规范的快速变迁,个人的疏离感普遍产生。目前,我国正处在转型期,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另一方面则对原有的社会体系造成巨大冲击,由此可能导致城市居民疏离感的产生和增加。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几千年的“熟人社会”在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大潮中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即便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单位制仍

* 本研究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社会质量与和谐社会建设研究”(11&ZD148)的阶段性成果,同时获得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

然是“熟人社会”的延续,人们可以在单位中寻找到帮助和依靠。但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去组织化”成为市场化的趋势,人从“单位中的个人”变为“单子式的个人”。在这一过程中,人是否会因为孤立无援而产生疏离感?在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对大城市而言,则是大量农民和小城镇居民的涌入。当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进入到新的城市空间开始新的生活和工作,并且在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进程中逐渐成为一种趋势时,城市最初的结构势必会发生相应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对城市中原来的居民以及外来人口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尤其是在严格的户籍制度下,居民对户籍隔离的认知如何?

二、文献综述与问题的提出

(一)疏离感的界定

早期的社会学家引用哲学对“alienation”的翻译——“异化”来指代社会学中的疏离。

霍布斯最早提出了异化(alienation,即疏离,下同)的概念,他的异化是指人亲手创造出来的独立于人并转过来支配人的矛盾现象(马克思、恩格斯,2000)。异化贯穿于黑格尔整个哲学体系中,但黑格尔强调的是精神的异化,而不是人的异化(马克思、恩格斯,1995)。费尔巴哈(1997)则又以人本唯物主义思想论述了人的异化。马克思正是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思想成就的基础上,研究和论述自己的异化理论和人本质思想的。马克思认为异化是一个包含主观和客观的复杂概念,涵盖社会分离和个性丧失两方面内容。客观成分是工人被剥削和缺乏控制权,主观成分是工人的无力感和自我分离感(罗宾逊等主编,1997)。其异化理论强调资本主义所刺激起来的现代工业使得以劳动表达人性日益困难。因此,劳动者从自身中、从他人那里、从自然之中疏离出来(马克思、恩格斯,2010)。

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涂尔干将异化概念发展并对疏离感产生的原因做出了阐述。涂尔干(2009)认为纯经济的或纯技术的分工由于缺乏坚实的道德基础而无法将个人整合到群体之中。这种分工留给个人的活动范围过于狭窄,不能有效地激发人们的积极性,不允许人们个性的充分发展。因此,人们很容易产生不满和厌倦情绪,产生一种同所属

群体的疏离感,从而造成了他同群体纽带的松弛。

社会学中的疏离是指个人同他的社会存在的主要方面相离异,是一种客观现象。在众多有关疏离的概念界定中,笔者倾向于认同的界定是:疏离反映的是一种社会关系,即低水平的整合或共同价值观,以及在社区或工作场所中,人与人或人与群体之间高度的距离或隔离(Ankony & Kelley,1999)。疏离感是疏离所引发的个体的主观感受,实证研究一般会选择疏离感作为研究对象,即个体或群体的主观疏离感受,这也是本文研究的主题。疏离感的主要特点为社会分离,无规范状态,个人疏远和无能为力(Seeman,1959;Dean,1961)。

(二)社会变迁与疏离感

本文主要的研究内容是在市场化和城市化的社会变迁过程背景下产生的城市居民疏离感问题。与我国社会变迁类似的是在本世纪初的中欧和东欧,所不同的是这些国家经历的更多的是政治变迁。研究表明,这些国家确实存在疏离感,并且呈现失范的趋势,即由心理层面的疏离逐渐转变为行为方面的偏离(Huschka & Mau,2006)。在旧的政治系统崩溃之后,社会学家面对的不仅是政治变迁,还需要面对社会经济系统的基本转变。这些变迁影响了公民切实的生活处境。东欧变化的特别之处在于旧体制被意外瓦解,持不同政见的小群体是主要推动者,大部分公民在瓦解旧系统的过程中没有发挥积极的作用而只是服从,在社会主义体制内被社会化,事实上是“毫无准备地陷入被动”,因此呈现出疏离感。

然而,社会变迁的影响既不统一也不彻底,而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宏观水平上的疏离感可以影响人们的经济财富,但是这里也有“隐藏”的稳定性结构。疏离感产生的一个重要根源是社会层面共同价值观的瓦解、传统信仰的消逝,以及绝对理性的动摇。

(三)疏离感的影响因素

疏离感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转型效应促成了社会行为规范体系的错乱;二元社会结构带来的两种文化视阈并存;加速转型引发的制度变迁多维化效应;技术扩展和唯效益论使得个人价值沦丧。

如果社会变迁被看作是疏离感产生的宏观原因,那么从微观层面来看,疏离感产生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本文主要从社会地位、社会凝

聚、社会包容和户籍隔离几个层面来讨论。

有关政治疏离感的研究结果显示,社会地位高的人政治疏离感低。(王蕴娇、沈明明,2011)。其中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与政治疏离直接相关。低水平的社会凝聚对很多层面的疏离感都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在对农民工城市疏离感(周红,2013)、少数民族学生文化疏离感(杨东等,2009;蔡婉君,2010)、狱警工作疏离感(Poole & Regoli,2006)的研究中发现,研究对象与周围群体的交往与互动往往成为影响其疏离感的主要因素。我国学者对疏离感的研究往往将社会包容作为疏离感产生的原因,如对流动儿童、进城务工人员的疏离感原因分析(雷鹏等,2011;周红,2013)。但实证研究中并没有将社会包容纳入进来。那么,如果将社会包容作为一个变量来检验其对疏离感的影响,结果会如何呢?

人口学变量对疏离感的影响也是极为显著的,如研究发现女性的疏离感水平比男性要低,并且十分显著(杨东等,2009;Steitz & Kulpa,1984;DiPietro & Pizam,2008;雷鹏,2011)。国外研究发现(Huschka & Mau,2006),就业状况可以看作是疏离感的一个决定因素,因为工作场所对社会整合的积极作用,也因为工作可以提供收入,可以有效减少不安全感。相反,失业者失去了来自工作场所的社会整合和收入,这也与经济水平对疏离感呈负向影响相吻合。

此外,户籍隔离也是影响疏离感的重要因素。

李强(2011)认为外来人口社会融入困难的一个突出表现是人际交往断裂和社会网络的“孤岛化”,即外来人口与异质性群体的社会联系程度很低。尽管部分外来人口融入城市的期望很强烈,然而户籍制度却成为不可逾越的鸿沟,社会歧视和社会排斥的存在也影响着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崔岩,2012)。关于南非种族隔离的研究也发现,隔离对社会失范有显著影响(Huschka & Mau,2006)。既然户籍隔离会产生诸多问题,那么户籍隔离本身对疏离感的影响是怎样的,其对疏离感的影响是否与南非的种族隔离对失范的影响有共同之处?

(四)问题的提出

过去疏离感问题的研究往往集中在特定群体和特定层面的讨论。本文则从更广泛的层面对城市居民疏离感问题进行研究。只有实现了更广泛层面的研究,才能对各个层面和各个群体的疏离感问题有更全

面的掌握。同时,鉴于户籍隔离问题也是我国城市普遍存在的问题,本文还对户籍隔离下居民的疏离感进行分析,探讨户籍是否可以成为解释居民疏离感问题的因素。

基于上述考虑,本研究将建立多层次模型,通过对数据的分析,以实证方法研究上述各个因素对城市居民疏离感的影响,进而讨论社会变迁引发的城市化和市场化对疏离感的影响。

三、研究框架与研究设计

(一)研究内容

本研究的出发点是考虑到中国社会正在经历范围广泛且影响深刻的转型过程,社会仍处于分化、解组、整合和流动比较剧烈的时期,因此这个时期的居民可能存在疏离感的问题。同时,也考虑到由于存在户籍隔离等各种形式的的不平等,因此,社会的不平等群体存在不同层次的疏离感。本研究通过2010年上海的调查数据,旨在利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探究城市居民疏离感的影响因素。

首先,我们对本研究采用的数据中疏离感的各项指标和疏离感指数进行了简单统计(见表1),显示了疏离感五个指标的各项平均得分情况,每个变量最高得分为5分(非常认同自己有这种情况),最低得分为1分(非常不认同自己有这种情况)。其中“我的现实生活与理想生活差距很大”这一项的得分最高,其次是“我对未来不持乐观态度”,而“很多人轻视我”这一项的得分最低。由此可见,上海市居民的确存在疏离感问题,尽管大部分的得分低于平均分(3分),但是因为不能找到相关的比较数据显示上海居民的疏离感程度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处于何种水平,因此不能主观断定上海市居民的疏离感水平高或低。但可以认定的是,上海市居民确实存在疏离感问题,这也是本研究的基本研究前提。

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我们将要探究上海城市居民的疏离感影响因素,检验户籍状况、社会地位、社会凝聚和社会包容对疏离感水平的影响。同时密切关注性别、年龄、就业状况和婚姻状况等人口学变量,以了解以上因素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释城市居民疏离感问题。

表 1 上海居民疏离感情况

变量	频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我对未来不持乐观的态度	1128	2. 35	. 89	1	5
我的现实生活与理想生活差距很大	1128	3. 10	. 98	1	5
要获得成功,我被迫要去做不正确的事情	1128	2. 32	. 86	1	5
我感觉被社会遗弃	1128	2. 03	. 73	1	5
有很多人轻视我	1128	1. 94	. 66	1	5
疏离感指数	1128	11. 74	2. 77	5	23

(二)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于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调查研究中心于 2010 年 6 - 7 月在上海市区进行的入户调查。该调查主题为《世博与上海社会质量》,在社会质量的研究中,疏离感被认为是社会赋权维度的重要指标,社会质量高的社会居民疏离感水平往往较低(张海东主编,2011)。因此本调查中对疏离感问题有专门的测量。

本次调查在上海市内采用 PPS 抽样方法。抽样的具体步骤如下:(1)按照 PPS 方法,在上海 12 个区抽取 43 个居委会;(2)按照简单随机原则,从每个被抽中的居委会中选取 30 个被访户;(3)在选定的被访户中,由访问员按照生日法(被访户中生日最靠近 7 月 1 日的居民)选择合适的被访者,最终成功访问了 1203 位 18 - 69 岁有过非农工作经历的上海市居民。由于部分缺失值的影响,本次研究中删去了 75 个样本,最终获得 1128 个有效样本进行统计分析。

(三)变量

1. 因变量

因变量为疏离感水平指数。塞曼(Seeman,1959,1967,1972)首先将疏离感纳入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他建议从社会心理学层面检验疏离感的五个方面,从而建立一个更加具有研究可行性的内容体系:(1)劳动疏离感(在劳动中丧失了目的);(2)无力感(无法影响社会的感知);(3)社会孤立感(和他人、集体和社会之间不能保持频繁接触的感情);(4)价值疏隔感(有意义的价值和共同目标的丧失感);(5)自身疏外感(丧失了明确统一性的感觉)(转引自杨东、吴晓蓉,2002)。本调查根据塞曼建立的疏离感的五个维度,将五个维度操作化为:

- (1)“社会孤立感”操作化为“我感觉到被社会遗弃”。
- (2)“劳动疏离感”操作化为“要获得成功,我被迫要去做不正确的事”。
- (3)“自身疏外感”操作化为“有些人轻视我”。
- (4)“无力感”操作化为“我对未来不乐观”。
- (5)“价值疏离感”操作化为“现实与理想之间差距较大”。

受访者从以下几个选项中选择一项:非常同意(5分)、同意(4分)、中立(3分)、不同意(2分)、非常不同意(1分)。为了便于更直观地进行分析,将这五种情况加总求值,从而得到一个疏离感指数。指数越高,疏离感水平越高。

2. 自变量

(1)社会地位:①经济水平,采用的操作化指标为家庭经济水平,根据问卷中“在扣除各种税费之后,去年您家庭的全部收入是多少”进行统计分析,模型中收入的单位为万元。②教育水平,教育水平采用教育年限的计算方法,分为没有接受正式教育(赋值为3)、小学(赋值为6)、初中(赋值为9)、高中(赋值为12)、大专(赋值为15)、本科(赋值为16)、研究生及以上(赋值为19)。

(2)社会凝聚:①社会联系指数,它反映的是与家庭成员、朋友、同事和邻居四个人群的联系频率,分为一天多次(5分)、至少一周一次(4分)、至少每月一次(3分)、一年几次(2分)、很少(1分)。将这四类人群的联系频率加总,产生了一个变量,即社会联系指数。该变量数值越高,表明受访者与他人联系的频率越高。②社会团体参与指数。这个变量包括是否参加了体育或娱乐团体,艺术、音乐、教育或文化团体,工会、职业协会、非政府组织、业主委员会等组织。0表示没有参加,1表示参加了但不是活跃分子,2表示参加了且是活跃分子。所有10类组织的活动情况加总后产生了一个变量,即社会组织参与指数。

(3)社会包容:本研究选择了社会受歧视指数作为社会包容的指标,在调查中我们询问了受访者在生活中是否由于以下几种原因而受到过歧视:社会地位、身体残疾、年龄、性别、外表、出生地、学历、病历、户籍、信仰。0表示没有受到过该类歧视,1表示受到过该类歧视。所有10类歧视加总后产生一个变量,即社会歧视指数。数值越大,说明受访者遇到的歧视情况越严重,也就是社会包容程度越低。

(4)户籍隔离:本研究主要研究本地户籍与外地户籍的差异,该变量为一个虚拟变量(0=非上海户籍,1=上海户籍)。

3. 控制变量

(1)性别。虚拟变量(0 = 女性,1 = 男性)。

(2)年龄,年龄²。为了考察年龄可能产生的二次方效应,除了采用年龄外,我们采用年龄² 这个变量,同时,为了便于观察,我们将年龄² 进行了年龄²/100 的处理。

(3)婚姻状况。这是一个虚拟变量(0 = 未婚,1 = 已婚)。为了便于统计,我们将未婚、离异、丧偶等婚姻状况统一定义为“未婚”。

(4)就业状况。这是一个虚拟变量(0 = 失业,1 = 就业、在学和退休)。

(四)回归模型

本文将疏离感看作一个连续的线性变量,采用 OLS 回归模型来估计参数值。由于其他的变量也多为定距变量和定序变量,因此本文采用 Robust 方差估计调整参数值。同时为了避免出现统计偏差,对所有回归模型都做过共线性诊断,各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都小于2,这也就证明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故在各表中也就不一一列出 VIF 等共线性诊断参数。模型采用分步回归的方法,先根据不同自变量分别做回归分析,再将所有自变量纳入回归模型中分析。

四、统计结果

(一)居民疏离感影响因素

在对个人状况(年龄、年龄²、性别、婚姻就业状况)进行控制之后,我们检验了自变量对疏离感水平的影响(见表2)。

表 2 关于居民疏离感影响因素的 OLS 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

变量	疏离感 模型 1	疏离感 模型 2	疏离感 模型 3	疏离感 模型 4	疏离感 模型 5	疏离感 模型 6
控制变量						
年龄	. 130 *** (-. 048)	. 122 ** (-. 0484)	. 125 ** (-. 049)	. 142 *** (-. 0462)	. 126 *** (-. 0483)	. 104 ** (-. 048)
年龄 ²	-. 136 ** (-. 054)	-. 142 *** (-. 054)	-. 131 ** (-. 055)	-. 143 *** (-. 052)	-. 133 ** (-. 054)	-. 125 ** (-. 053)

续表 2

变量	疏离感 模型 1	疏离感 模型 2	疏离感 模型 3	疏离感 模型 4	疏离感 模型 5	疏离感 模型 6
控制变量						
性别 (参照组:女性)	. 287 * (-. 165)	. 397 ** (-. 168)	. 383 ** (-. 165)	. 313 ** (-. 159)	. 271 (-. 166)	. 418 *** (-. 161)
婚姻状况 (参照组:未婚)	-. 787 *** (-. 231)	-. 770 *** (-. 233)	-. 737 *** (-. 233)	-. 833 *** (-. 222)	-. 766 *** (-. 232)	-. 697 *** (-. 229)
就业状况 (参照组:未就业)	-1. 052 *** (-. 382)	-. 868 ** (-. 377)	-. 658 * (-. 385)	-. 769 ** (-. 369)	-1. 084 *** (-. 383)	-. 367 (-. 366)
自变量						
家庭年收入 (万元)		-. 035 *** (-. 010)				-. 029 *** (-. 010)
教育年限		-. 131 *** (-. 029)				-. 107 *** (-. 030)
社会联系指数			-. 0946 *** (-. 028)			-. 0840 *** (-. 027)
社会组织参与指数			-. 145 *** (-. 034)			-. 146 *** (-. 033)
社会受歧视指数				. 946 *** (-. 010)		. 971 *** (-. 102)
户口状况(参照组:非上海户籍)					. 238 (-. 218)	. 871 *** (-. 227)
截距	10. 340 *** (-1. 032)	12. 480 *** (-1. 144)	11. 650 *** (-1. 105)	9. 492 *** (-. 998)	10. 310 *** (-1. 034)	12. 570 *** (-1. 180)
频数	1128	1078	1092	1128	1126	1043
R ²	. 023	. 063	. 051	. 096	. 025	. 163

注:(1)括号内为标准误。(2)* p < 0. 1, ** p < 0. 05, *** p < 0. 01。

1. 社会地位对城市居民疏离感的影响

将社会地位变量纳入模型 2 中可以发现,经济水平和教育水平对疏离感均有显著影响。模型 2 的统计结果显示,家庭收入增加,疏离感水平降低。经济状况对疏离感水平有反向影响,即经济状况越好,疏离感水平越低。家庭经济水平好坏代表了个人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由于经济状况良好的人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具备一定的话语权,有更多的方式和方法应对社会变迁。而经济状况不佳的人处于相对剥

夺的地位,因此无法很好地应对各种社会问题。教育水平对于疏离感有反向影响,教育年限越长,疏离感水平越低。教育水平不同使得人们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地位不同和认识问题的水平不同,从而影响他们对事物的看法。教育水平较高的人职业往往会更好,社会地位更高。教育水平高的人具有较为广阔的观察问题的视野,因此在排解压力方面比社会资源占有相对较少、教育水平低的人更好。综上所述,教育水平越高、经济水平越高,疏离感水平越低,由此可以推论社会地位越高疏离感水平越低,模型 2 能够解释 6.3% 的方差。

2. 社会凝聚对城市居民疏离感的影响

模型 3 发现社会联系指数对疏离感水平有负向影响,即社会联系指数越高疏离感水平越低。与外部人群的联系程度越紧密,个人的社会网络就越发达,发达的社会网络有助于个人应对各种外部问题和排解个人自身问题,因此也就有助于降低疏离感水平。社会组织参与指数越高疏离感水平越低。

3. 社会包容对城市居民疏离感的影响

模型 4 中歧视指数对疏离感有正向影响,即受歧视指数越高,疏离感水平越高。从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控制变量后,歧视指数解释了 9.6% 的方差。由于歧视指数作为社会包容的重要指标,所以模型 4 提示我们社会包容对疏离感水平有着重要的影响,良好的社会包容程度能够有效地减少疏离感的产生。

4. 户籍隔离对城市居民疏离感的影响

模型 5 中,户籍状况对疏离感并没有显著影响。通过图 1 中不同户籍的疏离感情况可以看出,上海户籍的疏离感水平略高于非上海户籍的人群,其中只是“有很多人轻视我”这一项上海户籍人群的平均分低于非上海户籍人群,其他均高于非上海户籍人群。在种族隔离的研究中,赫尔加和米勒(Helga & Miller, 2002)关于生活质量趋势的研究结果显示,那些本质上仍然拥有特权的白人对于未来是悲观的,有色人种、印第安人和黑人则相对比较乐观。可能是因为白人比较担忧他们拥有的某些东西会失去。同样,我们可以将这一结论同中国的户籍隔离进行类比,随着国家政策逐步聚焦于外地户籍人口的市民化问题,本地居民的特权相对减少,并且外地户籍居民的市场竞争力水平逐渐提高,也使得本地户籍居民的优越感开始降低。但是在上海,户籍歧视现象确实存在,所以可能会产生外地户籍居民被轻视的感觉略高于本地

户籍居民的现象,并且由于户籍差异带来的公共服务不均,使得户籍对疏离感的影响并不是直接发生作用的。但是模型 6 的结果显示,将所有变量纳入一个模型后,户籍隔离的影响就变得显著起来,由此看来,户籍隔离对疏离感是有显著影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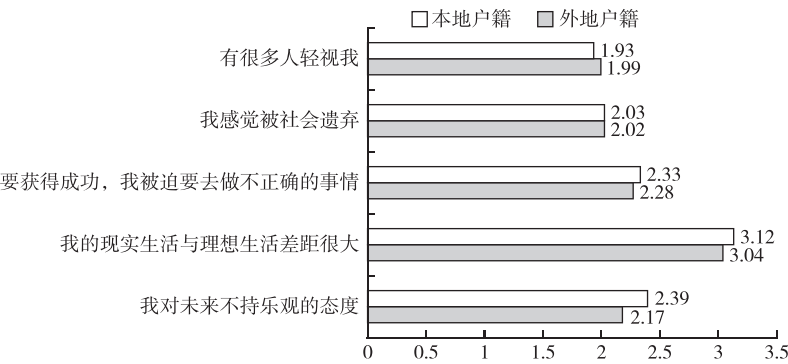


图 1 本地户籍和外地户籍间的疏离感水平差异

模型 6 将所有的自变量和控制变量都纳入其中,结果显示所有的自变量都对因变量有显著的影响,这一统计结果加强了前四个模型的结论,同时对模型 5 的结论进行了检验,模型 6 的 R^2 为 0.163,是所有模型中解释力最高的。据此可以认为,社会地位、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和户籍隔离对城市居民的疏离感都有显著的影响。

5. 个体特征变量对城市居民疏离感的影响

就控制变量对疏离感的影响来看,从模型 1 到模型 6 所有输出结果基本一致,性别和婚姻状况对疏离感的影响显著,即男性的疏离感水平比女性高,未婚人士比已婚人士的疏离感水平高。男性疏离感水平高于女性,可能是男性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压力高于女性,但在疏解情感方面的主观意愿和渠道比女性少,因而其疏离感的水平较高。已婚人士疏离感水平低于未婚人士,可能是已婚人士更容易得到来自家庭的支持,而未婚人士这方面的支持则相对缺失。另外,年龄对疏离感的影响也很显著,整体来看,年龄越大疏离感水平越高,同时,年龄²效应也很显著且呈现倒 U 型。根据计算,模型 1 到模型 6 的年龄拐点在 42 - 50 岁之间,也就是说,年龄越大疏离感水平越高,到 42 - 50 岁这个年龄段疏离感水平达到最高值,随后随着年龄增加疏离感水平越来越低。

此外,就业状况在模型 1-5 中都有显著影响,说明失业会增加疏离感水平,也验证了国外的研究发现。

(二)户籍内部差异的疏离感影响因素分析

社会隔离制度对城市居民疏离感程度具有重要影响。一些国家存在很严重的种族隔离问题,导致了很多社会问题乃至社会冲突。无论是否有法律规定,种族隔离使各种族不能同时使用公共空间或者服务,实际上是一种种族歧视行为。中国虽然不存在种族隔离问题,但是却存在户籍制度产生的户籍隔离。户籍与权利义务和资源配置等密切相关,城乡户籍的隔离,加上国家政策对户籍转换和迁移的严格控制,使得户籍隔离对于人们生活质量是一个潜在但又十分重要的影响因素。上海作为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其巨大的社会变迁必然会产生居民疏离感。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上海市全市常住人口 2302 万人,外省市来沪常住人口 898 万人,占全市常住人口的 39%。非上海户籍的居民,在社会资源方面较上海户籍居民有一定差距,在享受公共服务方面也比上海户籍居民少,同时来自经济方面的压力也会比较大,所以其面对的各种压力和困难都会很大,因此这两类居民的疏离感水平很可能会存在差别。

有研究显示,种族隔离内部的失范水平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大部分是由种族代表的社会经济因素决定的。此外,也有证据表明种族变量对所检验的社会经济变量没有完全的解释力,因为其影响超越了种族的范畴。这可能是一个暗示,即种族不是惟一的结构性标准。在中国不存在种族隔离的问题,但是不同户籍居民的疏离感问题是值得关注的。

表 3 不同户籍状况疏离感影响因素的 OLS 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

	模型 7	模型 8
变量	上海户籍居民疏离感	非上海户籍居民疏离感
控制变量		
年龄	. 137 ** (-. 053)	-. 014 (-. 121)
年龄 ²	-. 162 *** (-. 058)	-. 0151 (-. 143)

续表 3

	模型 7	模型 8
变量	上海户籍居民疏离感	非上海户籍居民疏离感
性别(参照组:女性)	. 481 *** (-. 180)	-. 005 (-. 372)
婚姻状况(参照组:未婚)	-. 684 *** (-. 256)	-. 197 (-. 536)
就业状况(参照组:失业)	-. 601 (-. 441)	. 221 (-. 665)
自变量		
家庭年收入(万元)	-. 0243 ** (-. 011)	-. 0368 (-. 024)
教育年限	-. 157 *** (-. 037)	. 00853 (-. 053)
社会联系指数	-. 079 ** (-. 031)	-. 089 (-. 057)
社会组织参与指数	-. 155 *** (-. 038)	-. 112 (-. 069)
社会受歧视指数	1. 169 *** (-. 129)	. 714 *** (-. 166)
截距	13. 450 *** (-1. 413)	13. 340 *** (-2. 541)
频数	839	204
R ²	. 186	. 137

注:(1)括号内为标准误。(2) * p<0. 1, ** p<0. 05, *** p<0. 01。

通过模型 7 可以看出,对于上海户籍的城市居民来说,所有自变量对疏离感均有显著影响,这也与模型 6 中的发现相似。上海户籍的居民社会地位越高,疏离感水平越低;社会凝聚程度越高,疏离感水平越低;社会包容程度越高,疏离感水平越低。但是模型 7 的结论并不适用于模型 8,在模型 8 中,受歧视指数成为惟一个对非上海户籍居民疏离感有解释力的自变量,其他因素的影响都不显著。与模型 7 的 18.6% 的解释力相比,模型 8 的解释力为 13.7%。

上面的两个模型以及图 1 显示,不同户籍的人群疏离感水平不同,对不同户籍人群疏离感影响因素也不同。事实上,户籍政策的存在使得社会流动过程中双方的利益都受到对方的影响或者威胁,双方在这

一过程中都产生了相对剥夺感。外地居民来到了城市,就会使本地居民认为外地居民抢夺了本该属于自己的就业、教育、公共福利等资源,尤其是近些年随着公共服务越来越多地向外地居民转移,本地居民的相对剥夺感逐渐加深;对外地居民而言,他们来到新的城市工作和生活,认为自己为这个城市付出了劳动,但是却不能受到与本地居民同等的待遇。他们认为自己要付出比本地居民更多的努力才有可能获得与本地居民同样的待遇,此外,他们还要饱受来自于本地居民的歧视和非议,相对剥夺感会更加强烈。各阶层间的歧视和偏见也进一步加深,疏离感无疑就成了歧视和偏见的产物之一。

综上,尽管模型对因变量有一定解释力,但还是有大部分并没有得到解释,这个结果与涂尔干关于疏离感这类行为是“整体性”的社会的规范缺失的解释相吻合。这也表明,上海居民的疏离感问题不仅受到疏离感和社会质量的各维度影响,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五、结论与讨论

疏离感是社会群体在社会变迁下主观心理感受等与所在的社会存在偏离的情况。因此,对于疏离感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变迁中个人与社会存在多大程度的偏离,同时也能检验社会在变迁的过程中哪些方面导致了个人的偏离。

本文以上述理论和现实为背景,对城市居民的疏离感影响因素以及户籍隔离下的疏离感进行了研究,得到了以下结论。

首先,疏离感受到社会地位的显著影响。教育年限的长短直接影响了居民社会地位和经济收益,因此教育水平高的居民观察问题的视野广阔,排解压力的社会资源充足,因而教育水平越高疏离感水平越低。经济水平对疏离感有显著影响,经济状况越好,疏离感水平越低。因为经济状况良好的人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并具有较强的话语权,处在社会的中上层地位,能够更好地应对社会变迁带来的变化和社会问题。但这也间接说明与社会地位相关的社会公平公正的问题,社会地位高的群体能够享受到社会公正对待,甚至享受到特权,并且能够掌握稀缺资源,而社会地位低的群体可能不仅得不到社会公平公正,还处于被剥夺的地位。因此营造一个互惠互利、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对降低

居民的疏离感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社会联系指数和社会组织参与指数作为社会凝聚的重要指标,对疏离感水平有反向影响,即社会联系指数越高,社会组织参与指数越高,疏离感水平越低。人作为社会人,与周围的亲人、朋友、同事和邻居等的互动必然会影响个体疏离感的水平;积极参与社会组织,能够让城市居民作为一个主动的个体融入社会事务,因此这也有利于降低疏离感。这也提示我们,提高社会凝聚水平,增加社会群体融入社会的机会和程度,有助于降低社会群体的疏离感水平。

第三,受歧视指数是社会包容的重要指标,它也是疏离感的重要影响因素。受歧视指数越高,疏离感水平就越高,可以说社会包容程度越高,疏离感水平越低。社会中的个人都是平等的个体,都在自己的岗位上为社会创造不同价值的财富,只不过存在多寡的差别,不能因此抹杀一些群体对社会的贡献。社会包容是指人们接近那些构成日常生活的多样化制度和社会关系的可能性,关注的是人们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实现个体平等的权利和价值以及获得来自制度和社会关系的支持和包容,以减少社会排斥(张海东等主编,2011)。因此提高社会包容程度、减少社会排斥、实现人人平等是减少疏离感的有效手段。

第四,本文还讨论了户籍隔离和疏离感二者之间的关系。户籍隔离对疏离感有显著影响,社会地位、社会凝聚和社会包容以及其他控制变量可以解释一部分本地户籍居民的疏离感问题,而对于外地户籍居民来说则完全不同,只有社会包容是自变量中对其疏离感有显著影响的因素。这就提示我们,增强社会包容、减少社会政策不平等能够有效地减少社会歧视,也能降低疏离感。

综上,城市居民在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影响下确实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疏离感,在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进程中,我国城市居民同社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偏离,而这种偏离一方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社会政策不合理的结果。由此看来,维护社会公平、增强社会凝聚力、扩大社会包容对于减少居民疏离感具有重要的意义,最终对构建和谐 society 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 安东尼·奥罗姆,2006,《政治社会学导论》,张华青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蔡婉君,2010,《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疏离感调查》,《社会心理科学》第8期。

- 崔岩,2012,《流动人口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和身份认同问题研究》,《社会学研究》第5期。
- 费尔巴哈,1997,《基督教的本质》,荣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黄丽、陈维政,2011,《组织氛围对工作疏离感和组织认同感影响研究》,第六届中国管理学年会——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管理分会场论文集。
- 雷鹏、陈旭,2011,《流动儿童疏离感的现状、成因及干预对策——基于城市儿童的比较》,《教育导刊》第10期。
- 李强,2011,《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半融入”与“不融入”》,《河北学刊》第5期。
- 罗宾逊、谢弗、怀特曼主编,1997,《性格与社会测量总览(上)》,杨中芳译,香港: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 马克思,2000,《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199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北京:人民出版社。
- ,2010,《共产党宣言》,卫茂平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米尔斯,1987,《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周晓虹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涂尔干,2009,《社会分工论》,渠东译,北京:三联书店。
- 王蕴赓、沈明明,2011,《个别群体中存在的政治疏离感及其对策建议》,《中州学刊》第5期。
- 杨东、吴晓蓉,2002,《疏离感研究的进展及理论构建》,《心理科学进展》第1期。
- 杨东、金钊、黎樱、张进辅、张庆林,2009,《汉族社区少数民族的文化疏离感研究》,《社会学研究》第3期。
- 张海东主编,2011,《社会质量研究:理论、方法与经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张海东、丛玉飞,2011,《社会质量与公正生活》,《吉林大学学报》第7期。
- 周红,2013,《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疏离感现象研究》,《人民论坛》第14期。
- Ankony, Robert C. & Thomas M. Kelley 1999, “The Impact of Perceived Alienation on Police Officer’s Sense of Mastery and Subsequent Motivation for Proactive Enforcement.” *Policing: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e Strategies and Management* 22(2).
- Blauner, R. 1964, *Alienation and Freedom: The Factory Worker and His Indust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ean, D. 1961, “Alienation, It’s Meaning and Measure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6(5).
- DiPietro, R. B. & A. Pizam 2008, “Employee Alienation in the Quick Service Restaurant Industry.” *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Research* 32.
- Durkheim, E. 1997/1893,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 Finifter, Ada W. 1970, “Dimensions of Political Alienatio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
- Helga, Dickow & Valerie Miller 2002, “South Africa’s ‘Rainbow People,’ National Pride and Optimism; A Trend Study.” *Indicator research* 59.
- Huschka, Denis & Steffen Mau 2006, “Social Anomie and Racial Segregation in South Africa.”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76.
- Lanning, Kevin 2008, “Democracy, Voting, and Disenfranchis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Journa of Social Issues* 3.
- Mason, G. L. & D. Jaros 1969, “Alienation and Support for Dangerous.” *Polity* 1 (Summer).
- Poole, E. D. & R. M. Regoli 2006, “Alienation in Prison: An Examination of the Work Relations

of Prison Guards." *Criminology* 19.

Seeman, M. 1959, "On the Meaning of Alien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4.

—— 1967, "On the Personal Consequences of Alienation in Work."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2.

—— 1972, "The Signals of '68: Alienation in Pre-crisis Fran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7.

Steitz, J. A. & C. M. Kulpa 1984, "Occupational Involvement and Alienation among Adults: The Effects of Gender and Ag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7.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社会学院

责任编辑:杨 可